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艰难的转变 冷战的初次缓和

葛腾飞 著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艰难的转变 冷战的初次缓和

葛腾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的转变:冷战的初次缓和/葛腾飞著.--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5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214 - 20614 - 5

I. ①艰… II. ①葛… III.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8956 号

书 名 艰难的转变:冷战的初次缓和

著 者 葛腾飞

责 任 编 辑 史雪莲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插页 4

字 数 24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214 - 20614 - 5

定 价 4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 课题的提出与研究价值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第一章 冷战初期的美苏对抗僵局和面临的紧迫问题 15

第一节 漸入高潮的东西方冷战 17

第二节 麦卡锡主义运动与美国的极端反共主义 26

第三节 美国推动西德重新武装与《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 29

第四节 苏联的德国政策与主动外交攻势 35

第五节 国际社会对冷战紧张对抗的疑问 40

第二章 苏美领导更迭与相互政策的初步调整 46

第一节 斯大林去世与苏联新领导集体的缓和攻势 47

第二节 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新战略 54

第三节 美英对苏联新政府缓和政策的最初反应 56

第四节 NSC162/2 号文件与美国对与苏谈判的消极态度 63

第五节 苏联新领导的对外政策争论与传统立场重申 72

第三章 西德重新武装与美国“实力地位”政策 83

第一节 美欧分歧与《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遇阻 83

第二节 美英协调与《巴黎协定》签订 91

第三节 核武库建设与美国军事实力的增长 102

第四章 赫鲁晓夫掌权与苏联对美国实力政策的应对	109
第一节 苏共高层斗争与赫鲁晓夫政治领导地位的确立	110
第二节 赫鲁晓夫访华与中苏协调	117
第三节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缓解	136
第四节 核力量、核政治与苏联“火箭核武器”战略	147
第五章 走向日内瓦：美国的决策	162
第一节 NSC5501号文件出台与美国对苏“演变战略”	162
第二节 美国政府确保《巴黎协定》生效	170
第三节 伦敦工作组会议及美英法外长协调	176
第四节 美国对四国首脑会议的基本政策	183
第六章 走向日内瓦：苏联的决策	196
第一节 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倡议与华约组织建立	196
第二节 奥地利国家条约：扫清四国首脑谈判障碍	203
第三节 改善苏南关系与赫鲁晓夫确立外交主导权	209
第四节 苏联参加首脑会议的基本政策立场	217
第七章 日内瓦首脑会议：议题、争执与结果	230
第一节 谈判的氛围	230
第二节 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	238
第三节 裁军问题与“开放天空”	242
第四节 最后的妥协	248
第五节 共同的遗产	251
第八章 转变的逻辑	257
第一节 初次缓和实现的条件	257
第二节 缓和与转变的限度	269
第三节 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冷战史意义	275
参考文献	286
后记	293

绪 论

一 课题的提出与研究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苏之间开启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国际关系史上破天荒的新现象，也是国际关系运行的前所未有的新方式。冷战开始后，美苏双方迅即进入持续紧张激烈的对抗，冷战中还爆发了局部性“热战”。但其时，美苏双方实际上对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对于冷战中的目标、战略策略行动以及冷战的长期过程，都没有深思熟虑的共识性谋划和周密的考虑，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斗争手段和方式，没有认真去研究认知冷战的特殊性质和独特的行为方式，尤其是核因素在国际形势以及在双方关系上的影响。经历近十年只紧张对抗不对话的状况之后，冷战终于出现了某种转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冷战初期国际关系中的一段令人注意的“解冻”时期，形成了美苏之间的第一次缓和，而日内瓦首脑会议则是这次缓和的高潮。这次缓和不同于冷战中后期美苏之间几次缓和的尝试。当时，美苏是从持续尖锐对抗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逐渐转变立场，在1955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终于走到谈判桌旁，举行了冷战开始后的第一次

东西方首脑会晤。通过对这一段时期的冷战进程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美苏之间冷战关系上的一些基本立场和策略手段的艰难转变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揭示尖锐对立的、处于明显安全困境之中的两大国家怎样一步步走向高峰会晤，从而为现实国际关系的和平运行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当时，在远东，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等远东热点问题已通过1953年7月签署的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和在1954年夏日内瓦会议上签订的相关协定而得到暂时解决。在欧洲，《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后，德国问题则成为此时期美苏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1955年5月《巴黎条约》生效，西德被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这标志着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军事集团的扩张目标基本完成。两大阵营的分裂对峙形态更为显然。两大阵营之间以政治和军事对抗为内容的冷战明显地构成当时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同时，威力巨大的热核武器在美苏相继试验成功又使核大战的阴影直接地笼罩全世界。面对核战争的可怕前景，广泛的热爱和平的中立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内的“维持现状派”英国、法国等均倾向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且都采取了推动缓和的政策和立场。在1953年初实现了政府更替的美苏两国新决策者，也都不希望因冷战持续紧张对抗而导致核大战的发生。鉴于现实的战略考虑、世界范围内广泛公众舆论形成的压力，以及来自盟友国家政府层面的缓和力量推动，美国和苏联政府都不得不进行认真的政策考量，改变冷战初期的尖锐对抗立场及其行为方式，并制定出新的政策。然而，对于冷战初期持续尖锐对抗的双方来说，这种立场和政策的改变确实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学者们利用新近解密的各种档案材料对冷战各个时期进行力求真实的重新考察，给现实各国的政府决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段冷战的第

一次缓和尝试在冷战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国内外冷战史学界以及国际关系学界对此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更谈不上系统深入的探讨。

本书希望通过冷战史的研究方法,分析出美国和苏联从 50 年代初期显然绝对式的安全困境状态中一步步走向相互对话和举行首脑会议的条件及动力,进而揭示出国际关系运行的某种一般性规律。通过历史的分析揭示出的这些条件和动力,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中的其他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相互关系问题。

本书还试图从美苏政府决策层面进行对比研究,即通过美苏两大国政府决策的互动、对比研究来展现出一段特定时期的冷战国际关系。关于 1955 年日内瓦首脑会议的研究本身在国际学术界也并不多,在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关于这次首脑会议的特殊性意义,本人也作了一些探索性的分析,指出这是冷战当中唯一一次集体性的东西方缓和,而且是冷战史上从僵化的两极结构走向松散的两极结构的标志性事件,它为此后的美苏关系缓和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总之,本书希望通过档案研究、对比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展示冷战初期美苏之间第一次缓和的过程,并揭示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填补国内国际关系史学界以及冷战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欠缺,同时也希望通过研究,为现实的大国对外决策提供一些具有参考意义的看法。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中文著作来看,南京大学教授石斌的著作《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对 50 年代中期美国对苏战略以及杜勒斯国务卿在其中的作用作了非常有见地的、细致的分析,该书是国内学者研究 50 年代

美国对苏政策的一本代表作。^①作者以对新近公布的外交档案文献的研读,和对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相关著作的精细批判为基础,通过对杜勒斯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考察了5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揭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战略的基本轮廓及杜勒斯在其中的作用。在与苏联进行谈判这一问题上,作者对杜勒斯的态度进行了有力的分析,指出杜勒斯在这一问题态度上的两重性和复杂性。对于最终得以召开的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作者也认为具有相当广泛的积极意义。^②但是,该著作的研究重点在于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尤其是杜勒斯国务卿在其中的决策作用,因此对日内瓦首脑会议本身不可能作出全面而详尽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的专题研究也并不多见。^③其中,Günter Bischof和Saki Dockrill主编的《冷战的喘息: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晤》(Cold War Respite: the Geneva Summit of 1955),是一本专门研究1955年7月召开的日内瓦首脑会议的论文集。该书就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召开背景、过程及美、苏、英、法等各方的态度作了比

^① 此外,刘同舜、姚椿龄主编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2—1955)》第7—1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2,1994,1997年版),对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的国际关系主要问题分专题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尤以资料性见长,其中第10册(1955年卷)有关于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的专题研究,但篇幅有限。另外必须要提到英国学者撰写的同类著作(有中文译本),分别是: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的《国际事务概览:195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科拉尔·贝尔的《国际事务概览:195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和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以1950年代作为研究对象,但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的著作还有:蔡佳禾:《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郑羽:《从对抗到对话: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朱昌等:《寻求美苏力量均势的努力:论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302页。

^③ 国外有学者围绕冷战时期的首脑会议这一主题作过专题性研究,例如:Gordon R. Weihmiller with Dusko Doder, U.S-Soviet Summits: An Account of East-West Diplomacy at the Top, 1955—1985,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1986; David H. Dunn, ed., 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ummitry, Basingstoke, U. K.: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96.

较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日内瓦首脑会议为什么没能实现实质性缓和的原因。其中,Ernest May 分析了首脑会议召开的背景,并且谈到了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围绕首脑会议的关系。Ronald Pruessen 用专门一章谈到杜勒斯在首脑会议过程中的作用。其他各章则分别谈到了苏联、英国、法国、西德等国对首脑会议的态度和政策。但是,由于该书为会议论文集,因此所涉国家广泛,每一篇侧重于从一个国家或一个专门角度来进行分析,就全书而言较缺乏对首脑会议的系统探究,难于了解首脑会议得以召开的较长时间的演进过程(实际上首脑会议的酝酿、准备到召开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全书也没有对会议的成果意义和影响进行分析。^① 另外还要提到 Ronald Pruessen 发表在 1993 年《政治科学季刊》春季号的论文“*Beyond the Cold War—Again: 1955 and the 1990s*”,该文从多种角度,并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对 1955 年和 90 年代的国际关系作了比较性研究,其中涉及美英等国围绕 1955 年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外交政策及其互动关系。但该文作为比较性研究,其视角和选材上都存在一定的取向性,而且出于篇幅原因,涉及 1955 年日内瓦首脑会议的研究内容是有限的,远未能充分揭示这段国际关系历史的前因后果。^②

由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的 Robert R. Bowie 和艾森豪威尔研究权威 Richard H. Immerman 合著的《维持和平:艾森豪威尔如何形成一种持久的冷战战略》(*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是一本非常权威的著作。作者通过切身的经历和大量丰富的档案资料,研究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1953 年夏秋讨论并最后制订美国基

^① Günter Bischof & Saki Dockrill, *Cold War Respite: the Geneva Summit of 1955*,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Ronald W. Pruessen, “*Beyond the Cold War—Again: 1955 and the 1990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Spring 1993, vol. 108, no. 1.

本国家安全政策(NSC162/2号文件)的过程。该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参加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基本过程和态度的变化。^① Raymond L. Garthoff 撰写的《评估对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意图和能力的估计》(Assessing the Adversary: Estimates by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of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一书的第一部分，分析了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意图及能力的判断，并揭示出美国政府的基本意图及其相应采取的对苏政策。但本书篇幅单薄，是一种比较概要性的分析。^②

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冷战时期的著作涉及对此时期国际关系、美国对外战略的分析。冷战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约翰·加迪斯的《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苏遏制战略的具体运行情况，指出了该时期遏制战略之不同于凯南所设计的遏制战略，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在具体运作对苏遏制时不同的政策环境和决策考虑。约翰·加迪斯的另外一本冷战史著作《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对50年代的冷战历史也作出了独到的分析，主要涉及核问题以及德国问题的分析。对于核武器在冷战初期美苏政策中的作用，作者作了比较客观冷静的评价。而对于50年代前期的美苏一系列互动，作者主要通过德国问题的分析，说明这一时期的互动虽然频繁，并最终召开了冷战期间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议，但是并没有解决导致冷战的各个问题，包括打破美苏在欧洲各自的势力范围，减缓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

^① Robert R. Bowie &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N. Y.: Oxford Univ. Press, 2000.

^② Raymond L. Garthoff, *Assessing the Adversary: Estimates by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of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The Brookings Occasional Paper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该书作为布鲁金斯非定期报告的一本，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是为了199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有关艾森豪威尔对世界事务影响的学术会议而准备的。作者曾经于1957—1961年在美国中情局任职。

赛,限制双方在第三世界的竞争等等。^①

另外,有关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个人的一些研究著作对该时期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材料和珍贵视角。与早期传统的艾森豪威尔研究批判性态度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研究的修正派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领导才能作出了正面的评价。^② Elmo Richardson 在其著作《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总统》(*The Presiden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中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外政策的信条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他将国际事务的性质界定为“自由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竞争。他认为,在 5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不会从军事上攻击西方“自由世界”,因为这会有导致其自身灭亡的危险,但其会努力通过武力颠覆或危害经济稳定来破坏其他国家的安全。第二,他认为,要确保“自由世界”的集体安全,除了要依靠优势的物质力量,还要依靠道义的力量来应对国际共产主义。整个世界围绕这两种力量分成了两个阵营。第三,他认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不是从事战争而是追求和平。当然,随着更多有关美国政府档案材料在 80 年代的解密,对艾森豪威尔的人物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和复杂。Richard A. Melanson 和 David Mayers 主编的《重新评价艾森豪威尔: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Reevaluating Eisenhow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50s*)中,对艾森豪威尔的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重新探讨和评价。其中, Kenneth W. Thompson 对艾森豪威尔总统领导方式的长处和弱点进行分析后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位非常自信和具有精明判断能力的领导人。Richard A. Melanson 对艾森豪威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rt four, part five.

^② 经常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修正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有: Elmo Richardson, *The Presiden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 Lawrence: Th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79; Stephen E.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Robert A.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Fred I. Greenstein,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尔对外政策的基础进行了分析，强调了艾森豪威尔对于美国因为冷战而成为一个军事化国家(garrison state)的担心。^①

相比起研究艾森豪威尔的著作，专门研究杜勒斯的著作似乎要少一些，其中 Richard Immerman 主编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冷战外交》(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0) 以及 Frederick W. Marks III 所著的《权力与和平：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外交》(Power and Peace : The Diplomacy of John Foster Dulles)，都是重新评价杜勒斯的代表性著作。Frederick W. Marks III 写道，在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和建立西欧联盟上面，对杜勒斯所作贡献的承认甚至连他应得的一半都不到。他说，传统上，杜勒斯国务卿得到展现的总是他那僵硬的一面，而他的灵活性，他对促成苏美缓和在背后所使用的一些手段，却很少或根本没有被提及。作者利用一些鲜为人知的大量细节性的档案材料对杜勒斯在包括《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西欧联盟条约》的通过、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召开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很大程度上由于杜勒斯的运作，使得美国政府这时期的对外政策呈现主动性特点，在美苏关系一系列重要事项的演进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②

关于苏联该时期对外政策的研究是日内瓦首脑会议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③ 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解密了大批的苏联档案材料，关

① Richard A. Melanson, David Mayers, eds., *Reevaluating Eisenhow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50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pp. 13–66.

② Frederick W. Marks III, *Power and Peace : The Diplomacy of John Foster Dulle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③ 例如：H. Hanak,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Death of Stali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2; Joseph L. Nogee, Robert H. Donalds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ergamon Press, 1984; Peter Zwick,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Process and Policy*, Prentice Hall, 1990; Adam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73*, Thomson Learning, 1994.

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祖波克(Vladislav Zubok)和康斯坦丁·普里沙科夫(Constantine Pleshakov)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一书中,依据掌握的新解密档案材料,从苏联国内决策的角度,从斯大林及其主要助手和继承者的行为及其背景当中,分析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日内瓦首脑会议前后的苏联对外政策决策,该书没有专门进行论述,但该书关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局及其对外政策的变化,关于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的政策主张及其矛盾斗争,均有助于分析苏联此时期对于西方的基本政策和态度。^① 祖波克的另外一本著作《一个失败的帝国:冷战中的苏联——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也是关于冷战历史的一本权威之作,该书对 20 世纪后半期的苏联对外政策进行了充分的解析,并且发掘了影响苏联对外政策的各种要素,包括政党和外交政策精英的态度、观点,以及政治局成员间的传统争论等等。^② William Taubman 在其新著《赫鲁晓夫及其时代》(*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一书中,以赫鲁晓夫的政治沉浮为线索,展现了赫鲁晓夫的一生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政策。其中有一章讲到 1953—1955 年赫鲁晓夫怎样一步步走向当权执政的过程,有助于分析当时的苏联政策,理解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判断。^③ Melvyn P. Leffler 的著作《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① Vladislav Zubok,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Vladislav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③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art 10.

the Cold War)则从内外政策的多重角度分析了冷战时期的双方互动，说明了冷战为何没有早点停止的原因。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日内瓦首脑会议，该书没有过多的篇幅去涉及，书中的第二章只是专门谈到了 1953—1954 年，即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与艾森豪威尔刚刚履任总统时期的苏美之间存在的所谓“和平的机会”。作者通过对苏联国内新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后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变化，以及对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决策分析，展现出冷战的互动以及缓和没有能够真正实现的原因。作者在全书贯彻的一个总的观点是，除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布什以外，由于客观环境以及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制约，拥有巨大权力的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都失去了机会去改写历史，结束冷战。^① 亚历山大·佩日科夫所著的《“解冻”的赫鲁晓夫》则分析了 1953 到 1964 年间的苏联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政治现实。该书对此时期苏联国内基本社会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去理解苏联该时期的对外政策决策。^②

核武器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对美苏双方的国家安全政策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由 Sean M. Lynn-Jones 和 Steven E. Miller 主编的《冷战及其以后：和平的前景》(*The Cold War and After : Prospects for Peace*) (Expanded edition)一书中，除了加迪斯的著名论文《长和平》，还有多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核武器在冷战时期扮演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些观点有利于我们冷静地看待核武器在 50 年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③ David

^① 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A divi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② 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刘明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该书指出，赫鲁晓夫之所以发动“和平攻势”，一是在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必然胜过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自信，二是为展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采取加强与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联系的政策。

^③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 Prospects for Peace*, Cambridge, Mass. : The MIT Press, Expanded edition, 1993.

Holloway 的名著《斯大林与原子弹》(*Stalin and the Bomb*)则以翔实、系统的资料分析了苏联早期的核武器发展情况，并且涉及斯大林去世之后的苏联核武情况，有助于分析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的对外决策。^①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 CWIHR Bulletin issue 4 (Fall 1994) 依据新解密的档案材料专门介绍了苏联核政策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冷战初期的苏联核历史，其中涉及很多对当时国际形势中的核因素的分析，也对研究该时期苏联及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

除了以上研究资料，还有该时期美国、苏联主要政治家们撰写的回忆录为本研究提供了相当有益的佐证，例如《艾森豪威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但由于当事人本身在较近历史时段上面临的敏感性，以及必然存在的程度不等的自我美化与对自身过失的掩饰，很多问题并没有详尽地予以解释，对 1955 年日内瓦首脑会议两者均着墨不多，且主要是一种就事论事式的说明。

另外随着美国档案的解密，如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数字国家安全档案(DNSA)，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缩微胶卷等档案资料，也为我们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运行的一些内幕情况。在最新解密的 DNSA 数据库文件中，50 年代中期的有关总统指令，包括美国对日内瓦首脑会晤的基本政策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以及有关美国对裁军问题的政策文件，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在苏联方面，沈志华编译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提供了该时期苏联有关裁军问题、核武器问题等方面的史料。另外，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发表了不少有关 50 年代中期前后的研究报告，涉及

^① 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尤其是第 14、15、16 章。

苏联政策、裁军问题、中苏关系、苏联东欧关系等方面,对本研究帮助甚大。^①

中国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档案对于研究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中国外交政策甚有帮助。通过对这段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及其实践的初步把握,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远东问题的走向及其对整个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影响。

事实上,50年代中前期这段国际关系实际上呈现远比美苏两极的遏制和反遏制更为复杂、更多形态的画面。这是以美苏两极之间的斗争为主体,以复杂的多种力量互动予以补充而呈现的结果。在对5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有不少便是从美国和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对英国丘吉尔首相50年代中前期外交政策的研究。Klaus Larres 和 Kenneth Osgood 在其主编的《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冷战》(*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一书中,有专门一章(Klaus Larres 撰写的第七章: the Road to Geneva 1955: Churchill's Summit Diplomacy and Anglo-American Tension after Stalin's Death)分析了斯大林去世后丘吉尔对首脑会议的寻求,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英美关系,分析了首脑外交在缓和冷战过程中所起到的地位和作用。虽然丘吉尔对

^① 例如: James Richter, "Reexamining Soviet Policy towards Germany during the Beria Interregnum"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 Working paper no. 3), 分析了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当权时苏联对德国的政策; Vladimir O. Pi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WIHP Working Paper No. 13), 则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大国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设计,提供了从非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苏联对外政策的宝贵视角和史料; Vojtech Mastny, "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 Sovie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1949—1956"(CWIHP Working Paper No. 35), 分析了此时期苏联对北约的政策和立场; Matthew Evangelista, "Why Keep such an Army? 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CWIHP Working Paper No. 39), 则分析了赫鲁晓夫时期有关裁军问题的政策立场和实际行动,并且就其动因作出了分析,指出赫鲁晓夫的大规模裁军虽然有着其他方面的动因,但毫无疑问是有着缓和国际局势和美苏关系的实质性考虑的。